

亚洲城市移民:中国、韩国和马来西亚三国的比较

张继焦

[摘要] 从对人口迁移有影响的都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移民政策、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的层面,比较和分析了中国、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三个亚洲国家的城市移民之间的差异:韩国的城市化水平最高,其集聚经济效应也最高,人口迁移的驱动力较强。马来西亚的城市化水平中等,其集聚经济效应较高,人口迁移的驱动力中等。中国应该提高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减少国内移民政策的限制和缩短城市移民的适应过程,由此,加速城市化进程,以便解决城市贫困问题。

[关键词] 城市移民;中国;韩国;马来西亚;都市化;移民政策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08)02-0002-07

Urban Migrants in Asia : A Contrast among China , South Korea and Malaysia

ZHANG Ji-jiao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 From different angles of urbanization , industrialization , migration policies , state policies ,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which have bearings on population flow , this paper makes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population flow in three Asian countries , namely China , South Korea , and Malaysia . South Korea is most urbanized , resulting in its great agglomeration economic effects and great driving force for population migration . Malaysia is moderately urbanized with medium agglomeration economic effects and driving force for population movement . Therefore , China needs to improve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ic effects of its cities , reduce restrictions on internal migration , and accelerate the migrants' adaptation to city life , so as to speed up its urbanization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urban poverty .

Key Words : city migrants ; China ; South Korea ; Malaysia ; urbanization ; migration policies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移民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和学者的高度关注。

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都出现了巨大的移民运动。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2004年发表的《2005年世界移民报告(World Migration 2005)》:2000年全世界共有1.76亿移民,到2005年全球移民人数增加到了1.92亿人。在亚洲,移民人数也从1970年的2810

万人,增加到了2000年的4380万人。根据中国政府的估算,有超过40万的中国人在国外充当劳工。

都市的诱惑是世界性的。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大量的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落后地区向富裕地区迁移。都市人类学必须关注这类新兴的经济社会现象。关于城市移民的研究,人们往往从经济的视角看得较多,因为城市移民的收入提高与对城市经济建设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城市移民不仅仅是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移民从农

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为了深入分析城市移民及其适应状况和过程这个微观层面的问题,在本文中,笔者探讨了对人口迁移有影响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水平、都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移民政策等宏观和中观层面的问题。

本文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三个国家:东亚的中国和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将这三个国家的城市与移民拿来进行比较是一件复杂而困难的事情。在此,笔者将尽力而为。

二、都市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一) 都市化与人口迁移

人们希望住在城市。在现代社会,城市化仍是为大量居民提供住房、就业和服务的最有效率的途径。当5个、6个或7个家庭成员在城市有一份有新工作时,很少遇到想放弃免费或租金较低的住所、搬到条件较好但更贵的地方去住的贫民窟居民,更别说想回农村老家,重拾辛苦的庄稼活的人了。就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而言,到2000年,东南亚的城市化水平,除城市国家新加坡和文莱外,还有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都超过50%了。

人们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期阶段,人口向城镇迅速集聚的中期加速阶段和进入高度城市化以后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又趋缓慢甚至停滞的后期阶段。当然,这只是就城市化过程的一般趋势而言。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异。

在中国,1200年广州(后来英国人称为“Canton”)就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过20万。但过去数十年所发生的一切,无论在规模和速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亚洲,随着移民涌出农村,去寻找工作和致富机会,预计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数量将升至三百五十个以上,而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千万的“特大城市”数量,也会在当今二十来个的基础上增加。亚洲庞大的人口意味着全球半数城市(无论大小)将在亚洲。未来二十五年内,预计亚洲的城市人口会增长70%,即十亿人。人们甚至在谈论人口逾二千万的超大型都市,这被联合国称为“特大城市”或“超级城市”。亚洲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城市——东京-横滨,而下一个可能是囊括香港、深圳和广州的日趋融为一体工商业都会。联合国人居署表示,人口过千万的城市实力之大,将使它们在许多层面上成为一个城邦,独立于国家和地区之外。

事实上,在许多领域,巨型的城市比独立国家更

为重要。在2000年时,30个世界最大的城市聚集了3.44亿居民。这个数字等于联合国80个最小的成员国的人口之和。400个巨型城市的人口数量与多数独立国家的总人口相当(与此同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居住在四个国家:中国、印度、美国和俄罗斯)。

巨型城市世界正在日渐取代由领土国家(territorial nations)构成的旧世界。1975年至1999年间,在全世界400个(居民超过1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中,有103个人口翻了一番多或增加了两倍,但其中只有5个属于发达国家,其他的均在发展中国家(20个在非洲、18个在印度、11个在中国、8个在拉美,其余的在亚洲或中东)。在200个独立国家中,有一些国家被唯一的、集中了该国20%的城市人口的巨型城市所支配。我们称之为“独体(monolithic)”或“单头(monocephalic)”国家。在1999年时,有74个独体国家的主要城市居民超过100万(如阿富汗喀布尔、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等),30个独体国家的主要城市居民超过300万(如泰国曼谷、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等)。那些拥有若干个大城市,而没有对一个其他的城市具有支配地位的国家,被称为“多极(multipolar)”或“多头(polycephalic)”国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城市的巨头性(macrocephalism,字面意义为:相对其身体,头部比较大)和多极性取决于国家自身的规模。在世界上最大的几个国家(如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和巴西等)以城市的多极性为特征[中国的城市不但是多头的,而且形成了京津塘、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三个都市圈(牛凤瑞、盛广耀,2006)]。在这些国家中,最大的几个城市在一定的地域内居支配地位。巨头性在中小国表现得比较明显。只有不多的国家,如葡萄牙和比利时,其城市是双头(dicephalic)的。

对待位于发达国家的巨型城市和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我们要区别看待。如今,在西欧和美国,巨型城市已进入停滞状态,继续向外延伸的是远郊地区。相反,在发展中国家,巨型城市依然在发展和膨胀之中。这种变化遍及巴西、尼日利亚、墨西哥,以及印度(该国拥有11亿人,是全球人口第二大)。在印度,当她于1947年独立时,德里还是一座只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如今,它的人口为1400万。班加罗尔的人口已由20世纪60年代的100万,升至目前的600万,甚至更多。孟买的人口已超过1800万,成为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而它仍在继续发展。这种城市化进程,催生了一个由咨询顾问、建筑师、技术人员、公共交通专家组成的全新行业。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人口跨国流

动与迁移的新时代。20世纪80年代初,旅居国外的人口大约有7700万,到2000年,国际移民的数量高达1.25亿(其中包括1800万难民)。据联合国(UN)预测,2007年某时,全球67亿人口中的城市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个历史转折点耐人寻味。

正改变着我们世界的城市移民现象,不只是农民成为佣工或工人的故事,也是民工们用收入资助子女读书的故事。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子女也许能得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城市办公室工作,让他们有机会跻身新兴中产阶层。

(二)都市的集聚经济效应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任何一个区域,无论是小的区域,还是一个大的综合经济区,它的全部产业在宏观上都要求组成一个规模适当、结构合理、联系密切的集聚体,才能最大限度获得集聚经济效应。在微观上,区域内的主要产业,特别是第二、第三产业,又总是成团地集聚在区内一些生产发展条件较为优越的点上,而不会普遍分散到全区各地。这是因为,把那些在生产上或分配上有着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有着相同指向的产业,按一定的比例,成团地布局在某个拥有特定优势的区域,有利于形成一个地区生产系统。在系统中,每个企业都因与其他关联企业接近而改善了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从中受益。因集聚而造成的有利环境,被称作“集聚经济效应”。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在一个城市过度集中,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历史、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是大规模人口迁徙城市改变地球面貌的最明显例子,因为中国有13亿多人,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中国南方,深圳原是一个渔村,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它在30年间变成了一个有800万移民的工业城市。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市也集中了城市人口的大部分,并且聚集了马来西亚30%以上的经济总量。

表1显示了对韩国不同行业的集聚经济效应的估计结果(Henderson, J. V., T. Lee & J - Y Lee, 1999),其中,集聚效应用弹性系数来表示。假若某个行业的集聚弹性系数为0.06,那么就意味着本地同行业的就业人数增加1%,就会给企业的产出带来0.06的增长。这样,对一个城市中的某个企业来讲,假设与该企业同行业并同在本城的其他企业拥有一千名工人,该企业如果搬迁到同行业拥有一万五千名工人的另一个城市中去。那么,在不改变该企业自身投入的情况下,企业借助于集聚经济的外部性作用,可以增加20%~25%的产出。

表1 韩国城市集聚经济效应估计

行业类型	集聚经济效应(弹性系数)
传统行业(食品、纺织、服装、木材、造纸和家具)	0.021
重型行业(金属、化工和塑料制品的生产和制造)	0.082
运输业	0.096
机器和电子设备	0.053
高科技行业(计算机、通信、电视、无线电和科技仪器)	0.056

资料来源: Henderson, Lee & Lee, 1999。

从表1可以看出,不同的行业集聚效应也不相同,其中运输业的集聚效应最高,重型加工制造业次之,而传统行业最低。

研究者还发现,在韩国,行业按集聚效应的大小确定的位次完全与行业在城市间的空间集中程度的位次相符。从而,重工业和运输业往往集中在一些高度专业化的城市中,以便充分利用当地的集聚效应;具有较低集聚效应的传统行业却分布得较为分散。不过,这种集聚效应对特大城市,如首尔来说,却不起作用。

亨德森(Henderson)发现,存在着与上述静态集聚效应相对应的动态集聚效应。由于存在着动态集聚效应,一个城市过去的产业环境将通过本地的知识积累影响到今天的生产率。因此,对于那些没有历史的行业来讲,企业的聚集是不利的,因为新的企业没有过去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所效仿。这一点很有启发意义(Henderson, J. V., T. Lee & J - Y Lee, 1999)。

目前,以广州、深圳为首的华南地区均感到企业增长的后劲不足,而上海却以咄咄逼人的增长姿态令华南地区乃至香港感受到竞争的压力,许多大型跨国公司都将其总部从北京、广州乃至香港搬迁到上海。一些人将上海的吸引力和成功归结于这个城市特殊的工商业“基因”,实际上,这种“基因”就是上海曾经作为亚洲最大的金融、商贸和制造中心的“知识积累”或“历史记忆”。

(三)人口迁移都市:是需求驱动,还是供应驱动

在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三国城市中都存在着大量的国内和国际移民。对于这类现象,人们除了探讨其推力和拉力之外,还在分析它是由于需求驱动的,还是由于供应驱动的。

萨斯吉雅·萨森(Saskia Sassen)称这类移民之为“需求驱动移民”(Sassen, S., 1991:91, 113)。然而,一些批评者指出,移民潮一旦上路,就使得原先的需求达到饱和,这些移民开始通过移民网络自我繁衍(Light, I., 2000:162~181. Light, I., Kim, R. and Hum, C., 2002:151~167)。即移民的第一阶段是需求驱动,第二阶段是供应驱动。正如马

舍、杜朗和马洛恩(Massey, Durand and Malone)所说的“累积原因”(Massey, D., Durand, J. and Malone, N. J., 2002:20),即移民活动一旦发生,就会自己产生独立于初始启动条件之外的动力,此后,它无需原来的启动条件也会继续下去。

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三国城市收入分配的变化,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出现了高收入阶层,另一方面是由于有大量的外来移民作为低工资的劳动力后备军,因为当地居民看不起这些低收入职业。

劳动力市场因此形成一种两重结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本国或本地劳动力相结合,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外来农民工或海外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本土中小企业部分地与移民劳动力相结合。

有些学者指出,涌向城市的移民潮来势之猛,超过了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Williamson, J. G., 1990:102~104)。经济学家评论这种移民活动来源于对城市就业机会的非理性乐观态度(Todaro, M. P., 1969:138~148),另一些学者则称之为“过度城市化”。表面上,城市化是由移民驱动的,似乎这些为数众多的城市居民根本无任何谋生之道。哈特(Hart)突破这些认识误区,指出:城市中存在着非正式经济,如小商小贩、修理铺、各式各样的服务业、没有许可的出租车,如此等等,各行其道使得移民可以据此养家糊口(Hart, K., 1973)。所有这些既不在政府的视野和管理之内,也不在任何统计机构的统计之列。实际上,非正式经济部门为移民驱动的城市化,为大量移民提供了维持生计的门路。少数民族经济体和城市非正式部门应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不仅能够吸收在业已饱和的主流劳动力市场上找不到工作的多余劳动力(Pecoud, A., 2002:494~508),而且缓解了移民入境国家和迁入城市经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的困境。

在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大城市与边远农村地区之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马来西亚的城市与印度尼西亚农村之间、韩国城市与中国农村之间,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存在的互补性和劳动力成本方面呈现的两级结构,使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存在劳动力流动的需求和动力。

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三国城市经济的迅猛增长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双重紧张:工人工资的增加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举步维艰;工人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多使结构性劳动力短缺迫在眉睫。对此,这些城市都采取了“移资”与“移民”相结合的应对措施: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允许部分农民工或外国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在城市中就业,填补低级劳动岗位出现的空缺。

(四)人口迁移都市的流向和规模

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出现了巨大的移民运动。

据联合国(UN)的报告,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虽然还有不少移民前往传统的移民接受国,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但是前往中东地区的减少了,而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相邻国家之间的迁移却增多了。比如,大量印度尼西亚外劳进入马来西亚和韩国的城市中。在中国,也有一些移民从朝鲜和越南等邻国非法进入。

在马来西亚和韩国,人们更关注的是外来的国际移民问题。而在中国,国内的人口流动现象更为引人注目。中国国内的人口迁移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宏大的社会流动,也是世界各国中人口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移民行动。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有14439万人。其中跨省的有4242万人,省内的有10197万人。在省内不一致的人口,有2332万人是市区内人户分离的。由此计算出,全国流动人口为12107万。2002年9月9日,上海市南京路步行街上人流如织。据最新统计数据,上海市目前常住人口已达1640万,外来流动人口达380余万,是人口规模意义上的世界第五大城市。

一方面,在整体人口迁移的数量方面,中国的城市远高于马来西亚和韩国两国的城市,但是,就城市人口占国家人口总数而言,韩国最高,达90%;马来西亚次之,占60%;中国较低,占40%。另一方面,就单个城市而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和韩国首都首尔最近几十年由于经济繁荣发展与人口膨胀,都成为所在国的单头巨型城市,并已经采取了迁移政治首府的措施,而中国的北京虽然人口已经聚增至1500万,成为世界级的巨型城市,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不打算迁都,但一直在采取各种行政管理手段严格控制北京市的人口数量。

总之,在人口迁移流向方面,中国以国内移民为主,韩国国内和国际移民较多,马来西亚国内和国际移民都有一定的规模,但对国际移民开始限制。在人口迁移的规模方面,在三个国家中,中国无疑是最宏大的。在人口迁移并实现城市化方面,在三个国家中,目前中国的发展速度最快,但是,韩国的人口城市化程度最高,马来西亚次之,中国较低。

三、政策对都市移民的影响

(一)移民政策对人口迁移都市的影响

1. 国内移民政策。在对国内迁移人口方面,中

国与马来西亚和韩国两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管理政策。

在马来西亚和韩国,对国内的人口流动和迁移都没有任何明文政策、规定和限制,但有不同形式的登记制度。

中国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社会管理成本和城市化适应的最大障碍。户籍制的核心一是属地管理,二是身份管理。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户籍制度为政府给“非农业户口”分配生活必需品提供了帮助,但是,严格限制了“农业户口”向城镇和大城市的人口迁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不断地放宽,但对身份管理没有改变。1997~1998年,部分从农村到小城镇工作、购建房或有直系亲属在城镇居住的人,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户籍制度逐渐走向松动。2001年,对申请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2004年以后,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先后开始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居民统一户口成为大势所趋。

2. 国外移民政策。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三国对国外移民都有比较严格的政策和法规。这三个国家的国外移民政策有共同的地方:就是对移民的限制。

3. 三国移民制度比较。比较来看,马来西亚和韩国两国对国外移民的管理制度,与目前中国部分城市依然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有着诸多类似之处。即移民有了进城就业的权利,但他们不能在城市生根,由于移民政策衍生的其他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教育制度、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形成了马来西亚和韩国两国的外国劳工与中国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这种制度障碍传递到马来西亚和韩国外国劳工与中国农民工的身上,主要表现在角色转换与身份依旧的状况上。角色是指社会规定的用以表现社会地位的模式化行为。角色是身份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地位的外显形式。通常的情况下,角色转换与身份的转换具有一致性。当一个人获得了某种职业,他就具体地扮演这个社会角色,随之也获得了相应的社会身份。但这一过程在马来西亚和韩国两国的外国劳工与中国农民工身上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角色与身份相分离的情况。从角色看,这些移民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换,农民工劳动方式由务农转变为务工经商,劳动地点由农村到城市,由野外到工厂,劳动性质由纯体力到体力与脑力结合。从角色上讲他们扮演的是工人。但问题在于转换角

色通过个人努力就能够做到,转变身份则需要制度与社会的认同。他们在城市中打工无论多长久,对所在城市的归属心理始终无法产生。

(二) 国家政策对城市移民处境的影响

在国家政策与不同民族城市移民的处境方面,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三国中,韩国因为是单一民族国家,也没有城市移民限制政策,因此,其城市中国内移民处境的差异性不显著。而马来西亚和中国的特殊情况值得分析一下。

1. 马来西亚国家政策与城市移民的处境。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实施了一项为期20年的、马来民族和原住民优先的“新经济政策”(The Malaysian New Economic Policy,简称“NEP”)(Means, Gordon P., 1991: 8, 14, 15, 23~27; Putra, Tunku Abdul Rahman, 1986: 98),旨在实现“消除贫困、重组社会”的目标。1990年又开始执行“国家发展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延续)极力地培养和扶持马来民族企业家,大大增加了马来民族人口在城市中的就业人口,进一步壮大了马来民族在国家政治和城市经济中的实力(M. Fazilah Abdul Samad, 2002)。华人人口在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时,比例约为40%,到2001年已降至25.7%,华人城市人口和经济实力虽有增长,但与马来民族相比,增幅较小。目前,华人在马来西亚半岛上的蓬勃经济扩张已经大不如前了。马来西亚不但出现了大量与旧的中产阶级并存的新的中产阶级,而且出现了新的马来中产阶级或称“第二代中产阶级”。这引起了其他民族(如华人和印度人)和马来民族下层人民的不满(Shukor Omar, 2003)。

2. 中国国家政策与城市移民的处境。这里,我们想谈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城市农民工问题,二是城市少数民族移民问题。

(1) 关于城市农民工,虽然户籍管理制度逐渐松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的恩彭(Abdul R. Embong)教授,作为社会学家是马来西亚研究中产阶级的主要学者。他是从参加台湾社会学家萧新煌20世纪90年代主持的大型研究项目开始这方面的探讨的,后来他自己主持了相关的研究工作。2005年恩彭教授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了笔者的访问,并赠送了有关的研究成果。见:Abdul R. Embong, 2001, The Portrayal of the Malaysian Middle Classes, in Exploration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Hsin - huang Michael Hsiao, Taiwan: Academia Sinica, Dec.; 2002, State - led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Malaysia, UK: PAL GRAVE. 对新的马来中产阶级,恩彭教授后来明确地称其为“第二代中产阶级”,见:Abdul R. Embong, 2005, Between Optimism, Contestation and Caution: Understanding the Sociocultural Dynamic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Middle Class in Malaysia, IKMA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6, July.

动,且有取消的趋势,但是目前城市农民工依然存在着角色转换与身份依旧的问题。从角色转变看,农民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换,劳动方式由务农转变为务工经商,劳动地点由农村到城市,由农村到工厂,劳动性质由纯体力到体力与脑力结合。问题在于转换角色通过个人努力就能够做到,转变身份则需要制度与社会的认同。尽管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已经基本像市民一样生活、工作,但就身份而言,他们仍然未被户籍制度认可,仍然未被城市居民所认同。农民工总是一群被贴上了农民身份标签的群体。同时,农民工外出打工无论多长久,土地仍然可以保留。土地保障既为农民工化解了他们外出时特别是失业时的风险,但也使他们无法割断与土地的“脐带”,土地牵制效应使农民工对城市没有产生根本性依赖的条件,对城市的归属心理始终无法产生。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制订和实施相关政策,以使农民工在城市中能够做到角色转变与身份转变相一致。

(2)城市少数民族移民问题。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目前中国城市里的流动和常住少数民族人口约有900万左右,已形成了成百上千大大小小的居住群落。在中国各个城市里,已呈现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其一,少数民族迁移就业和创业对城市的贡献不小,不可忽视。其二,少数民族移民与城市居民在宗教信仰、族际通婚、民族认同、语言使用、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少数民族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矛盾与冲突。这是城市民族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或新的工作任务。其三,少数民族移民大多原来的经济状况较差、文化程度也较低,在城市就业和创业中处于弱势群体,政府有关部门是否应出台有关的优惠政策,值得考虑。因此,如何从国家政策角度处理好城市少数民族移民问题是一个紧迫的新课题。

中国政府向来十分重视民族问题。1984年中国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法》,1993年国务院出台了《城市民族工作管理条例》。2004年,中国又出台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修订本。但是,到目前为止,上述法律和法规还不能完全针对或解决由于城市少数民族移民而出现的各种问题,如城市民族关系、城市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等。据了解,有关政府部门正在着手制订新的政策。

四、结果与讨论

综合上述的描述和分析,在这里,笔者以量表打分的方式,对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三国的城市与移

民进行一个简要的比较。在这里,所设立的各项指标是笔者初步设计出来,每一项指标不一定是非常合适或准确的,姑且把它们作为一种衡量的尺度而已,这样可以让人们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而并非是为了使笔者的分析达到百分之百准确的程度。

表2 中国、马来西亚和韩国三国的城市与移民比较表

序号	中国	马来西亚	韩国
1 城市化水平	2	3	4.5
2 城市移民规模	4.5	3	2
3 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	3	4	4.5
4 国内移民政策限制程度	3	0.1	0.1
5 国外移民政策限制程度	5	3.5	4
6 人口迁移的驱动力	4	3	4.5
7 城市移民的适应程度	3	3.5	4
8 城市贫民问题	2	3.5	1
合计	26.5	23.6	24.6

说明:在每栏中,5分为最高分,1分为最低分。共有8个指标,总分为40分。

由表2可知,韩国的城市化水平最高,其集聚经济效应也最高,人口迁移的驱动力较强,但其国内移民政策限制程度极低,有利于推动人口迁移和城市经济的发展。马来西亚的城市化水平中等,其集聚经济效应较高,人口迁移的驱动力也中等,其国内移民政策限制程度极低,在一定条件下推行国外移民政策,有利于国内人口自由迁移并有限度地引进外国劳工,推动经济的发展。马来西亚还需要提高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并解决城市贫民问题。中国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人口迁移的驱动力较高和城市移民规模巨大的情况下,应该提高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减少国内移民政策的限制和缩短城市移民的适应过程,由此,加速城市化进程,以便解决城市贫民问题。

[参考文献]

- 牛凤瑞,盛广耀,2006:三大都市密集区:中国现代化的引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Henderson, J. V., T. Lee & J - Y Lee. 1999. Externalities and Industrial Deconcentration under Rapid Growth[M]. Mimeo:Brown University.
-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ght, I. 2000. "Globalisation and migration networks". In Rath, J., (ed.), Immigrant Businesses[M]. New York: St. Martin's

2006年10月笔者从国家民委政法司有关政府工作人员处获知:他们正在修订《城市民族工作管理条例》,以便符合新的发展情况。

Press.

Light, I., Kim, R. and Hum, C.. 2002. "Globalisation effects on employment in Southern California, 1970 - 1990" in Cross, M. and Moore, R., (eds), Globalisation and the New City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ssey, D., Durand, J. and Malone, N. J.. 2002. Beyond Smoke and Mirrors[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Williamson, J. G.. 1990. Coping with City Growth during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daro, M. P.. 1969. "A model of labou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9. 1984, "Urbanisation in developing nations: trends, prospects, and policies", in Ghosh, P. K., (ed.),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M]. Westport, CT: Greenwood.

Hart, K.. 1973. 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in Ghana[M]. in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1.

Pecoud, A.. 2002. Weltoffenheit schafft Jobs: Turkish entrepreneur-

ship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Berlin [M].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26.

Means, Gordon P.. 1991.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utra, Tunku Abdul Rahman. 1986. Political Awakening, Pelanduk Publications[M]. ISBN 967 - 978 - 136 - 4.

Shukor Omar. 2003. The Malay Lost World with Emphasis on Entrepreneurship [M]. Malaysia: Anzagain And. Bhd.

M. Fazilah Abdul Samad. 2002. Bumiputeras in The Corporate Sector: Three Decades of Performance 1970 - 2000 [M]. Mahbob Yusof, University of Malay Library.

收稿日期 2007 - 11 - 20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刘秀玲]

[作者简介] 见封面作者简介。

大明山下元龙坡的铜卣是西瓯骆越瘞埋——礼拜山岳留下的东西

1974年1月19日~20日,广西武鸣县马头公社全苏大队第一生产队农科组的几位社员在苏罗村全苏勉岭挖出一件兽面纹提梁铜卣,后报告给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之后广西考古专家蒋廷瑜教授前后三次前往全苏勉岭实地考察,随后在该地还出土有一个铜戈。类似这样的铜卣,1976年8月在广西的兴安县也出土了一件。这两件铜卣的提梁是陶索形的,颈部有夔龙纹,腹部有兽面纹装饰,底部有金文“天之父”三个字,都是商代晚期文物。大明山下的兽面纹提梁铜卣1991年1月经全区馆(所)专家审定为一二级藏品;1995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藏品专家确认组审定,确认为一级藏品。

对于大明山出土铜卣的来历,蒋廷瑜、潘郁生、李伟东等于2007年4月13日在《广西日报》上撰文认为:商代铜卣之所以埋到武鸣来,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南方民族首领在同商或商的属国打仗时虏获了这件铜卣,作为战利品带回。二是南方民族首领向商王进贡,商王将铜卣回赐给使者带回。三是商末初周中原战乱,失败的奴隶主南逃,把铜卣带到广西来。

对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大明山下元龙坡的铜卣是西瓯骆越(瘞埋)礼拜山岳(大明山)留下的东西。主要的理由是,考虑到出土铜卣所在地方的环境,都是处在高山周围,兴安的猫儿山是以越城岭主峰猫儿山为中心的高山(因山形如猫而得名猫儿山,地跨兴安、资源、龙胜3县,相对高度1862米,最高峰海拔2142米,为华南最高峰)。广西的大明山位处广西中部偏西南宁东北部、红水河和右江之间,北回归线穿过大明山腹部。起于马山,横跨武鸣、上林,终于宾阳县,绵延三百多里,宽五十多里。其山体走向从西北走向东南,地势为西北及顶峰线一带高而东南低,是桂中南最高峰。在广西两处最高峰的地方出土有相类似的兽面纹提梁铜卣,足以说明是生息于此地的西瓯骆越对山岳崇拜礼仪后留下的东西。因为铜卣本身是一种盛酒器,是商代人用来祭奠祖先和神灵的酒器。

圣山崇拜在世界范围内曾经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圣山崇拜观念的产生,与古人对天地形状的认识有关。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产生了天圆地方的观念,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地是平的。连接天地的是位于地中的天柱。圣山崇拜就是这一认识的自然产物。由此而形成了对山岳崇拜的礼仪。古代的祭祀方式,在典籍《尔雅·释天》中有这样的记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悬,祭川曰浮沉。”远古时候生活在岭南的西瓯骆越把大明山视为神山,因为大明山的壮语名字叫“Byacwx”,“Bya”为山的意思,“cwx”为祖或者天柱的意思,直译就是壮族祖宗神山、灵山、天柱山的意思。即为山的祖宗和“万山之宗”。在《山海经·大荒南经》关于大明山古为“天之山”和《淮南子·地形训》把赤水(红水河)视为帝之神泉的记载,透露了大明山在壮族先民西瓯骆越心目中可能是一座神山天梯的信息:漫入云天的大明山位处被古人视为帝之神泉的赤水(红水河)旁边,这为人们认定大明山是壮族先民西瓯骆越所崇拜的圣山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古代,西瓯骆越无非也都是使用这样的方式祭神灵,没有例外。现代的考古出土器物印证了这一点,在大明山最高峰龙头峰的山脚下——武鸣马头苏罗村全苏勉岭遗址就是古代西瓯骆越祭山的地方。当时的古人在苏罗村全苏勉岭遗址这个文物坑将瘞埋与燔燎两种方式合一,用上述珍贵物品(兽面纹提梁铜卣)盛酒进行祭山(天)。(作者简介:黄世杰,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学术秘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